

張覺述作集

吳越春秋校證注疏

張覺◎撰

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我將自己的作品集命名為“述作集”，即源於此。不同的是，我雖然好古，卻信疑參半，所以於“述”之外又不免有所“作”。



和识产权出版社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上海市教育委員會科研創新項目資助

張覺述作集

吳越春秋校證注疏

張覺◎撰



知識出版社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内容提要

本书作者以现存最早的《吴越春秋》刻本——元大德十年丙午（公元1306年）绍兴路儒学刻明修本为底本，同时又参校了其他明、清版本，清人校勘记，类书、古注的引文，以及《左传》《国语》《史记》等史籍异文，在尽最大努力核对找寻正确原文的情况下，广采前人解说，对《吴越春秋》作了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的注释，并以准确、明白、通俗的白话对其原文作了疏解。同时，在每篇之前撰写了提要，对其内容及特点作了概括述评。书末附有可靠的研究资料，可供读者进一步研究之用。

责任编辑：江宜玲

责任出版：刘译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越春秋校证注疏/张觉撰.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11

（张觉述作集）

ISBN 978-7-5130-2428-0

I. ①吴… II. ①张… III. ①中国历史—吴国（？～前473）②中国历史—越国（？～前306）③《吴越春秋》—译文④《吴越春秋》—注释 IV. ①K22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69230号



张觉述作集

吴越春秋校证注疏

WUYUECHUNQIU JIAOZHENG ZHUSHU

张觉撰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发行电话：010-82000860转8101/8102

责编电话：010-82000860转8339

印刷：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开本：720mm×960mm 1/16

版次：2014年1月第1版

字数：489千字

ISBN 978-7-5130-2428-0

网 址：<http://www.ipph.cn>

邮 编：100088

传 真：010-82005070/82000893

责编邮箱：jiangyiling@cnipr.com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27.25

印 次：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98.00元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張覺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日於曲阜孔廟（丁雲亮攝）

張覺教授主要研究中國古典文獻與傳統文化、漢語言文字學。

已由20家出版社出版著作42種，主要有《韓非子導讀》（巴蜀書社1990年版）、《白話搜神記》（嶽麓書社1991年版）、《韓非子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商君書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吳越春秋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論語〉〈孟子〉精華譯評》（中國旅遊出版社1993年版）、《荀子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曾鞏散文精選》（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潛夫論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常用成語詞典》（黃山書社2000年版）、《〈孟子〉句式變換釋例》（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現代漢語規範指南》（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2年版）、《〈韓非子〉選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韓非子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商君書導讀》（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9年版）、《韓非子：帝王的法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韓非子校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韓非子校疏析論》（知識產權出版社2011年版）、《商君書校疏》（知識產權出版社2012年版）、《韓非子考論》（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年版）、《中國古代文學》（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年版）。其中《韓非子校疏》於2011年榮獲第十四屆華東地區古籍優秀圖書獎一等獎。

此外，已在《文史》（北京）、《中華文史論叢》（上海）、《中國文化研究》（北京）、《學術研究》（廣州）、《漢學研究》（臺北）、《孔孟學報》（臺北）等126種刊物上發文308篇，並完成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韓非子》微觀研究”（批准號：04BZX031）、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重點科研項目《韓非子校疏》（批准編號：0314）和《商君書校疏》（批准編號：0863）、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韓非子考論》（批准號：10YJA720041）的研究工作。

現正在從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吳越春秋校證注疏》（批准號：13BZW092）、上海市教育委員會科研創新重點項目《潛夫論校箋注疏》（批准號：14ZS079）的研究工作。

述作集自序

人活在世界上，有的地位甚高，身價不菲，但終其一生，其價值仍然可以用單一的經濟尺度去衡量——一輩子賺了多少錢；有些人的人生價值就不是單用金錢所能衡量的，這就是古人所謂的“不朽”。據《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記載，范宣子問叔孫豹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叔孫豹回答說：“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①由此看來，人的政治生命與其生理生命同樣脆弱。從政者即使能顯赫一時，但隨著其心臟停止跳動，其政治生命也往往就此結束，而不可能不朽。誠然，就是在古人心目中處於領先地位的“立德”、“立功”，我看其對後世的作用也有限。據杜預、孔穎達的注疏，所謂“立德”，是指黃帝、堯、舜之類的聖人“創制垂法，博施濟衆，聖德立於上代，惠澤被於無窮”；所謂“立功”，是指禹、稷之類的賢人“拯厄除難，功濟於時”^②。這些聖賢，雖然因其功德而名垂青史，但其功德也不過是讓人緬懷而已，由於時代的變遷，他們創制的東西早已不再有什麼實際的效應了。這種情況猶如司馬遷所感歎的那樣：“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③

在我看來，最有不朽效應的應該是“立言”，因為如果能“立言”於世，則可以永遠使後人在學習中獲益。誠如魏文帝曹丕之《典論·論文》所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④

的確，人在世上走一回，唯有給社會留下一些永遠值得後人利用的東西，

①《左傳·襄公二十四年》，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十三經注疏》，第1979頁。

②同上。

③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世界書局縮印本《史記》，第333頁。

④曹丕：《典論·論文》，中華書局1977年影印本《文選》，第720頁。



其生命纔有意義。否則，其存在與否也就無足輕重了。對於真正的文人來說，最高的追求應該是有不朽之作傳世吧。正是受到這種傳統思想的影響，我纔身處貧賤而仍加務於著述。

但是，曹丕所說的寫文章也好，今人所說的著書立說也好，與“立言”誠然是不能劃等號的。試看今日之世界，文章浩瀚如海，圖書堆積如山，其作者都能算作“立言者”而不朽麼？顯然不能。因為如今大量的文章與圖書不過是印刷垃圾而已。歷史是最公正無私的評判者。只有通過歷史的沖刷而流傳不衰反復重印的著作纔是不朽之作，只有貢獻了傳世之作的人纔能永遠活在人間。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我纔甘心久坐冷板凳，常泡圖書館，長年累月孜孜矻矻，不遺餘力精益求精，其目的無非是想使拙著贏得讀者的青睞而久傳於世。

據孔穎達的說法，“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老、莊、荀、孟、管、晏、楊、墨、孫、吳之徒製作子書，屈原、宋玉、賈逵、楊雄、馬遷、班固以後撰集史傳及製作文章，使後世學習，皆是立言者也”^①。如此，則我雖然努力於著述，卻又離立言者甚遠。因此，我不敢將自己的作品集名為“文集”，而用了一個前人未曾用過的名稱“述作集”。

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②我將自己的作品集命名為“述作集”，即源於此。不同的是，我雖然好古，卻信疑參半，所以於“述”之外又不免有所“作”。換言之，即既欲有所繼承以集前賢之大成，又欲有所發明以成一家之說。竊以為惟其如此，方能使自己的作品受人青睞而不朽於世。誠如孔子所言：“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③治學不能不有所思考，有所創新，但思索卻又必須以學習與繼承為基礎。所以，無“述”則學無根底，無“作”則學無所成。我之追求“述而又作”，即基於這樣的認識。當然，我的這一追求也與自己的才智有關。如今很多能人名流都是天才的創新發明家，所以他們能夠“不述而作”，完成一個又一個重大課題，獲得一個又一個大獎，這是我所無法企及的。

出版文集往往是大家的事。現在我出版自己的述作集，其實並不意味著要以大家自居。我出身貧寒，命運坎坷，一生貧賤，出版述作集本是連做夢也沒有想到的事。

1949年3月9日（農曆二月初十）夜，我誕生於江蘇省太倉縣茜涇鎮東

①《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其次有立言”孔穎達疏，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十三經注疏》，第1979頁。

②《論語·述而》，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十三經注疏》，第2481頁。

③《論語·為政》，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十三經注疏》，第2462頁。



街的倪家，這是當時我家借住的房子。平民百姓無家譜，所以大都不知道自己的老祖宗是誰，我家也一樣。據我父親的記憶，只知道我的曾祖叫張燕亭（1881～1944）。由於我父親外出工作，我的童年是在祖父母的撫育下度過的，因此也受到了叔父的啟蒙教育。正因為如此，我入學後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但是，我1965年考取蘇州高級中學後纔一年，原本穩上大學的前途一下子就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改變了，“一片紅”使我不得不帶病回鄉務農，十年青春就這樣在貧困的掙紮中耗掉了。

1977年恢復高考，我考入南京大學，接著又考入復旦大學攻讀碩士學位。但由於老家已分田到戶，我還得花不少時間回家種地。爲了徹底擺脫務農生涯而潛心於治學，我1985年初畢業後放棄了在重點大學任教的機會，到了空軍政治學院任教。哪知好景不長，1989年學院首長安排我轉業到太倉縣中學教書。爲了利用上海的文獻資料以從事古籍整理與研究，我只好辭不赴命而下崗待業在家。在下崗待業還未成爲社會普遍現象的當時，作爲一家之長，我所承受的經濟壓力、精神壓力與種種坎坷恐怕是一般人所難以想像與忍受的。

爲此，我窮而發憤，夜以繼日，賣文爲生，在待業的六年中，發表了一百多篇文章，還撰寫出版了《商君書·韓非子》（嶽麓書社1990年版）、《白話搜神記》（嶽麓書社1991年版）、《韓非子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商君書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吳越春秋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論語〉〈孟子〉精華譯評》（中國旅遊出版社1993年版）、《〈韓非子〉精華譯評》（中國旅遊出版社1993年版）、《白話商君書》（嶽麓書社1994年版）、《荀子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這些成果，雖然凝結著我身處逆境時的頑強、勤奮與心血，但我更要說的是，它們離不開出版界同仁的熱情幫助與支持。嶽麓書社梅季坤先生等滿懷古道熱腸而鼎力相助的動人場景，一直浮現在我的眼前。正是他們的雪中送炭，點燃了我熬過嚴冬的希望，使我身處鐵屋之寂寞而仍然不覺得孤獨，從而支撐著我艱難而順利地度過了那黑暗而冷酷的六年待業時期，同時又奠定了我的學術研究基礎。

1995年，在空軍政治學院石柏年政委的幫助下，我終於結束了待業生涯而轉業至上海財經大學基礎教學部任講師，並於1996年任副教授。此後雖然忙於教學工作，但寫書之興趣與動力猶存，故丹黃仍不絕於手，於是又有《曾鞏散文精選》（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潛夫論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新著問世。

人的希望或欲望大概總會隨著適合其發展的條件而不斷發展。在1986年，發表一篇文章就已令我高興萬分。1990年，出版一本書會令我激動好一

陣子。在那個時候，哪會萌生出版論文集或著作集的奢望呢？然而，書寫得多了，也就有出版著述集的基礎與願望了。1998年開始，我將出版《張覺述作集》的計畫寄給了不少出版社，但均未成功。這究竟是什麼原因，我一時也不太清楚。直到我歷經磨難於2002年又一次申報教授職稱受挫後，我纔稍微有所了悟——我非常珍視自己的著作，不過是犯了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所說的毛病：“夫人善於自見……家有弊帚，享之千金。”^①這些古籍譯注之作在很多學者眼中其實算不了什麼學術成果，搞古籍譯注也根本算不上什麼學術研究。如今的社會科學課題或評獎中大多沒有古籍譯注的一席之地，即反映了這一學術觀念。有一位好心的老師曾勸我說：“你還是去搞一點學術研究，別把精力浪費在這上面。”由此我深深地感悟到古代將文字訓詁之學稱為“小學”的道理——這種既夠不上“學術”又算不上“研究”的工作，何以不“小”呢？

慶倖的是，我的古籍譯注之作也並非沒有肯定者，它們也曾受到廣大讀者乃至一些專家的青睞與讚賞，因而往往一版再版。拙著在大陸與臺灣出版後，各地讀者紛紛來信，認為它們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不同於一般的古籍譯注本，為研究古代哲學、史學乃至文學者所必讀。南京大學一級教授兼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顧問程千帆先生曾來信說：“譯注雅見功力，可寶也。”^②臺灣輔仁大學哲學系丁原植教授也來電作了高度讚揚。挪威科學院院士、奧斯陸大學東歐東亞系教授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認為《韓非子全譯》是所有《韓非子》注譯本中最好的一種，因而將它用作英譯《韓非子》的底本。截至2013年1月，以古籍譯注為主的拙著，累計印數已達462820部，這充分說明拙著還是有讀者的。

即使從學術的角度來考察，我以為我的工作也不乏學術價值。由於古今語言與文物典章等方面的差異，因而要使中國古代燦爛輝煌的文化典籍不再死躺在藏書室之中而能“活著”流傳下去，使它成為當今乃至將來中華文化建設的豐富資源，就必須首先做好其校點譯注工作。古人雖然將文字訓詁之學稱為“小學”，但雖“小”卻還是一門“學”，而治此“學”者也還有不少被稱為“大師”的，可見這“小”之“學”中也自有大學問，認為它不是“學術研究”實為一種偏見。就是對古籍今譯提出過嚴厲批評的高嚴先生也曾說：“古文今譯是一門大學問，非淺識末學者所能勝任。在一定意義上說，它是古籍整理研究的最高形式，只有當版本、目錄、音韻、訓詁、校勘、考訂、語

① 曹丕：《典論·論文》，中華書局1997年影印本《文選》，第720頁。

② 張覺：《程千帆師書信三劄》，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7月22日，第17版。



法、斷句、標點的功夫都用到之後，方可談今譯；不僅如此，它還要求譯者有相當好的現代語文水平，如果讀者對像是兒童，還要掌握兒童語言的特點。正是如此，即使飽學之士，在古文今譯任務面前，尚‘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魯迅先生在《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曾這樣說過：‘我向來總以為翻譯比創作容易，因為至少是無須構想。但到真的一譯，就會遇到難關，譬如一個名詞或動詞，寫不出，創作時候可以回避，翻譯上卻不成，也還得想，一直弄到頭昏眼花……’這段話既適用外文翻譯，也適用古文今譯，充分說明，這是一項不好對付的學問，如果學無根底，是不可草率從事的！”^①高嚴先生與那些一味鄙視古籍譯注的學界名流相比，其學術眼光恐怕要高明一大截。因為高先生雖然嚴厲地指責“今譯十弊”，但對今譯工作並無偏見，而能實事求是地肯定它的學術地位。誠然，清代學者杭世駿早就說過：“作者不易，箋疏家尤難。何也？作者以才為主，而輔之以學，興到筆隨，第抽其平日之腹笥，而縱橫曼衍，以極其所至，不必沾沾獵祭也。為之箋與疏者，必語語核其指歸，而意象乃明；必字字還其根據，而證佐乃確。才不必言，夫必有什倍於作者之卷軸，而後可以從事焉。”^②這些言論，實在應該讓那些對古籍譯注不屑一顧的學界名流好好看看。

可惜的是，古籍譯注之作如今在一些學術部門中不算學術成果，於是一些專家教授因其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而不屑為，而一些“學無根底”的人也不把它當作學術研究來從事，只是以混稿費的態度去搞古籍譯注，結果也就產生出品質低劣的古籍譯注本而為衆人所指責。對此，高嚴先生曾指出“今譯十弊”：“出版無統籌，一書有數譯，一弊；版本不求善，率爾而操觚，二弊；考校不用功，將錯而譯錯，三弊；學問不到家，譯錯不知錯，四弊；主編不統稿，前後相矛盾，五弊；選譯無標準，避難而趨易，六弊；文字素養差，生澀又費解，七弊；翻譯不到位，半白夾半文，八弊；風格不統一，忠實原著難，九弊；不求信達雅，外行充內行，十弊。”^③這種種弊端，敗壞了古籍譯注的聲譽，使古籍譯注名聲掃地，從而玷污了其中的佳作。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

另一件可悲的事，則是人們所說的：現在已進入了讀圖時代，青少年喜歡看的是配圖的“文化快餐”。如果真是這樣，則長此以往，中國古代豐富的文化寶藏將被埋沒而無人問津，或只能任憑那些學術騙子信口開河，嘩衆取寵。

① 高嚴：《今譯十弊》，載《光明日報》1992年4月26日，第3版。

② 杭世駿：《道古堂文集》卷八《李太白集輯注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續修四庫全書》1426冊，第278頁。

③ 高嚴：《今譯十弊》，載《光明日報》1992年4月26日，第3版。



這種學風實在令人擔憂，但願將來會有所改觀。

出於信念與愛好，我並沒有因為學界對古籍譯注的指責與某些評委對拙著的否定以及青少年學風的轉向而有所動搖，而仍然潛心於我所鍾愛的古籍校疏工作。

張之洞說：“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①綜觀當今流行之典籍，精校之本不多。如陳奇猷的《韓非子集釋》^②與《韓非子新校注》^③，朱師轍的《商君書解詁》^④，高亨的《商君書注譯》^⑤，均利用第二手乃至第三手材料編著而成，以致以訛傳訛，貽誤無窮。有鑒於此，我立志重振古籍譯注之學術風範，注重學術考校，寫出帶有學術研究味道的、嚴謹而又具有較高質量的古籍校疏本。我想，做到了這一點，就一定能獲得廣大讀者的普遍認可，從而使自己的著作流傳不衰。因此，我一直沒去迎合當代專家評委們根據其癖好所擬定的“課題指南”寫一些不能流傳於世的“專著”以獵取名利，而仍然堅持不懈，決定傾注更大的精力與財力，將以往的著作，特別是古籍譯注之作，作一次全面詳盡的考校修訂，在以往譯注的基礎上進一步彙校善本，以便使拙著成為兼具資料性、權威性、學術性、通俗性的經典，並彙編為《述作集》逐漸推出，供認可拙著的讀者使用。

我出版《述作集》的總體目標是：弘揚漢學傳統，打造傳世力作，力求博雅完美，以便使拙著成為今後研究《韓非子》、《商君書》、《吳越春秋》、《潛夫論》、《老子》、《論語》、《孟子》、《搜神記》等傳統經典及其他相關領域時不可不讀的典籍而經久不衰。《周易·繫辭下》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⑥我在單位常不遇可謂之“窮”，轉而致力於著述可謂之“變”，研究時涉獵多個領域可謂之“通”，著述歷經二十多年而流傳之勢不減可謂之“久”，正可謂窮則思變變而通，通則久傳有何窮？拙著既合《易》道，亦當如《易》而久傳，這是我的心願，也是令我頗感欣慰的地方。我堅信，撰寫出版這些校疏之作，對於弘揚中華文化與便利廣大讀者來說，會像《十三經

① 張之洞：《書目答問·略例》，中華書局 1963 年版《書目答問補正》，第 3 頁。

② 該書於 1958 年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

③ 該書於 2000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④ 該書於 1921 年由上海廣益書局刊行。後來作者重加增訂，改名為《商君書解詁定本》，在 1948 年納入《國立中山大學叢書》由中山大學出版組出版，1956 年古籍出版社又據廣州本重排出版。

⑤ 該書於 1974 年由中華書局出版。

⑥ 《周易·繫辭下》，中華書局 1980 年影印本《十三經注疏》，第 86 頁。



注疏》那樣具有永久性的學術價值。

出版述作集的夙願已經開始成爲現實，這當然是值得慶倖的。在此，我首先要向此前慷慨解囊而購置拙著的四十六萬讀者致以衷心的謝意，並希望繼續得到更多讀者的青睞與支持。因爲經驗告訴我，我這種沒有權勢支撐而處於“學術圈”之外的“草根學者”的學術生命^①，在過去或現在，主要還是靠廣大讀者維持著，而不可能依靠單位的經濟實力去支撐。在將來，應該也是如此。這《述作集》的出版，如果沒有廣大讀者的熱愛支持與慷慨解囊，也將會難以爲繼。

當然，我也永遠不會忘記祖父張瑞良（1902～1972）、祖母俞秀英（1909～1989）、父親張永泉（1930～）、母親林月娥（1929～）、叔父張永奎（1939～）的養育啟蒙之恩與程千帆（1913～2000）、周斌武（1924～）等教授的精心栽培之德，如果沒有他們的培養，就沒有我的才學與成果。同樣，我也不會忘記章培恒、嚴佐之等教授對我古籍整理工作的熱情支持，不會忘記梅季坤（嶽麓書社）、李立樸（貴州人民出版社）、倪臘松（貴州人民出版社）、李大鈞（中國旅遊出版社）、金良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褚贛生（東方出版中心）、宋啟發（黃山書社）、徐文堪（漢語大詞典出版社）、呂健（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德明（嶽麓書社）、鄭明寶（上海古籍出版社）、江宜玲（知識產權出版社）等出版界同志先後傾注的厚愛之情以及吳格、劉一萍、錢振民、郭立暄、龔潔榮等先生在圖書資料方面的相助之力，如果沒有他們的熱情幫助，我也不可能有這麼多逐步積累而內容豐富的著作問世。

此外，我的同事龔敏，博士研究生黃吉輝，碩士研究生鄭興蘭、徐鵬、馬靜、尤婷婷、楊晶、張曉曄、呂佳、歐冬梅、羅婷、劉雪瑩、麻飄飄等也曾參與過部分工作，特此說明。

總之，我謹將這《述作集》奉獻給一切愛我的讀者、親人、師長、同志、朋友、學生，並借此機會向他們致以由衷的感謝與誠摯的祝福。

但願拙著因品質之有益於讀者而流傳久遠，從而使我的感謝與祝福也與

① 羅時進在《去除競爭性科研的幻影光圈》一文中說：“當學術權力得到部分回歸後，用學術思維、學術方式、學術標準管理科研的期待並不能完全實現，某些具有學術影響力者以‘熟人社會’的處世行事態度介入各種學術性活動，包括科研立項，經費分配，成果驗收，評獎鑒定，無不施其影響，如此則部分學科和學者資源累進，利益疊加，而弱勢科研群體，即使具有精英素質，其學術表達和發展的空間也被大大壓縮。”（羅文載《社會科學報》2012年12月6日第5版）我所謂的“草根學者”，恐怕是“弱勢科研群體”中的主要組成部分。



日俱增，使後人能永遠銘記愛我者的恩德，這便是我最大的幸福了。

對於拙著中的不當謬誤之處，我熱切地希望讀者批評指正，以使拙著不斷完善而成為學習與研究中國文化者所必備的要籍。

最後，附自題二首^①，以與同道者共勉。

早年心慕高校潔，豈料身陷淨土黑。自古聖賢盡貧賤，何況我輩孤且直。
貧而無諂常落寞，窮且發憤勤述作。笑看有司皆走肉，傾心拙著寄寥廓。

是為序。

張覺

1998年5月29日初稿於滬上五角場寓所

2008年6月23日再稿於滬上四平路金軒

2011年9月21日三稿於南翔芳林路院邸

2013年12月8日修改於密雲縣溪翁山莊

① 我在臺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韓非子》之後記中說：“憶及魯迅有《自嘲》詩云：‘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冬夏與春秋。’甚似為僕為之。”但仔細一想，並不十分貼切，故另作此二首。

前 言

要研究中國文化，必須閱讀中國古代的重要著作。《吳越春秋》作為一部流傳近兩千年的名著，當然也是研究中國文化者，特別是研究中國古代歷史和文學的學者所必須閱讀的。

張之洞說過：“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①《吳越春秋》固然是研究中國文化者必須閱讀的要籍，但綜觀當今通行的《吳越春秋》，卻尚無精校精注之作。現代受人推崇的校本似乎只有兩種：

一是江蘇古籍出版社 1986 年出版的苗麓點校本，它受到了周生春教授的重視，因而被周生春作為參校本來使用。該本以“大德本”為底本，比以《四部叢刊》本為底本更有價值，本應是一個較好的校本。但遺憾的是，其在校點排印中有不少疏漏，這種疏漏又導致了周生春的失誤。

二是周生春的《吳越春秋輯校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該書由於其書名具有較強的考校意味，又由具有權威名聲的出版社出版，加之書首所載序言的讚揚，所以一般人都認為它是一個理想的權威版本。其實，該書有不少錯誤，讀者如果不加注意，必將以訛傳訛，貽誤無窮。

我一向認為，要使中國古代燦爛輝煌的文化典籍能“真正活著”流傳下去，使它成為當今乃至將來中華文化建設的豐富資源，首先應該做好其“存古喻今”的工作，或者說，應該做好這些典籍的校釋評論工作。若無“存古”，則會造成新書出而古籍亡的嚴重後果；若無“喻今”，則古代的典籍只能是死躺於書櫃之中。只有這一艱巨而又偉大的基礎工程完成了，我國的古籍才能流布日廣而大放異彩，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才能傳承不絕而煥發出新的活力。

我所說的存古，與張之洞所說的“精校”相類，是指在印行古籍時要完好地保存古代的珍本文字。其主要的工作就是逐一將每部典籍的現存古本進行一次科學的梳理，辨明其源流，將其中最有意義的善本來一次彙校；然後覈定原文，寫成定本，複製出版以廣其傳；同時將彙校所得的善本異同寫入校勘記隨書印行，以便利更多的研究者取資。顯然，我所說的存古，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要做到絕對意義上的存古，那就只能搞《中華再造善本》之類的

① 張之洞：《書目答問·略例》，見范希曾編《書目答問補正》，中華書局 1963 年版，第 3 頁。

大工程了，但那樣做，顯然不適合大部分讀者而難廣其傳，而且，讀者也難以從中瞭解不同版本之異同。

我所說的喻今，與張之洞所說的“精注”與“知要領”相類，也就是要幫助今人明白古代典籍的內容。其主要的工作就是在校定原籍文本的基礎上，廣泛吸取古今學者的研究成果，做好實事求是而又準確通俗的注疏工作，使人們正確地理解其原文；同時，還應該對其內容進行概括扼要而又深入精到的剖析與融會貫通且聯繫實際的評論，使人們深刻地領會其內涵，把握其要領，瞭解其精華與糟粕，借鑒其中具有普遍意義與實用價值的人類智慧結晶。

然而，這種既具精校精注之功力又具提綱挈領之功能的宜讀之書實在太少見了。即使是我國古代最基本的要籍，也很少能見到這種既存古又喻今的著作出現。《吳越春秋》也是如此。

《吳越春秋》的當代校本之所以會出現上述種種很不理想的粗疏現象，可能是因為當今之學風過於浮躁、治學不求嚴謹、學問不求紮實的緣故吧。所以，我們在具備現代意識的同時，似乎還應該繼續宏揚漢學精神。

隨著時代的進步，現代的學術研究條件比過去要好得多。即以最基本的古籍校勘而論，舊時之古籍善本往往散落於民間而難以查訪，現在則多集中於各大圖書館而便於尋檢，所以，現在進行善本彙校的條件比古代要好得多。只要我們不惜工本，這一工作是完全可以做好的。但是，人們在校勘《吳越春秋》時，卻往往滿足於使用《四部叢刊》本，藏於國家圖書館的大德本雖然受到推崇，卻一直未為《吳越春秋》校勘者認真地使用過。如果說，當代的學風與學術評價標準並不利於善本彙校工作的展開，因為從事這項工作，不但枯燥乏味而需要有坐冷板凳的能耐，而且需要奔波於南北各大圖書館而投入大量的時間、精力與財力，其成果又因為缺乏當今所推崇的創新性而不被學術界認可，但無論如何，作為一個有責任心的學者，是絕對不應該急功近利、馬虎了事的。在我看來，既然古代有《十三經注疏》之類的扛鼎之作不朽於世，那麼，我們生活在條件優越的現代社會，理應拿出超越前人而能體現當代國學水準的古籍校釋評論之作來。惟其如此，我們才能不愧對創造了光輝燦爛的華夏文明的祖先。

基於這樣的認識，我一直在朝這一方向努力。然而，我過去所撰寫的著作，為了能順利出版，不能不屈從於出版社的體例限制，而根本不能將“存古喻今”的設想付諸實施。即以研究《吳越春秋》而論，過去出版的《吳越春秋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1 版，2008 年再版）、《吳越春秋校注》（嶽麓書



社 2006 年版)也都是如此,它們雖然已經受到了讀者的青睞而印行了 4 萬多冊,其實未足為典要。

為了豐富我的“存古喻今”成果,我決定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撰寫本書,力求為讀者提供一本嚴謹而全面地體現善本面貌並兼具學術性與通俗性的《吳越春秋》校釋本。由於《吳越春秋》的版本源流甚為清晰,所以在善本彙校方面就沒有必要像《韓非子校疏》和《商君書校疏》那樣將各本的文字差異全部寫入校勘記。但其大體做法還是一脈相承的,也就是說,撰寫本書時,仍將利用各種善本,並對自己以往的《吳越春秋》研究成果來一次清理、總結與提高——集其精華,刪其贅疣,正其謬誤,補其缺漏,以便使本書成為一部來自第一手材料的精到可靠而兼具權威性、資料性、學術性、通俗性的集大成之作,使之成為今後通行之善本而不朽於世。

由於《吳越春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我們必須重點研究的一流要籍,而無論從哪個角度去研究《吳越春秋》,校正勘定其原文都是首先要做好的最重要的基礎性工作。鑒於當今流行的各種《吳越春秋》校本對其原文的校訂都很不理想,更由於其中還存在著弄虛作假、以訛傳訛的現象,所以我首先在《吳越春秋》原文的彙校方面花了很大的精力。為了不折不扣地貫徹我的存古原則,我決定將國家圖書館所珍藏的後世所有《吳越春秋》版本之源的元大德刻明修本作為底本,再依據其他材料進行校正,而校改也採取審慎的態度而儘量保留大德本的風貌。但願本書的原文勘定能給今後的《吳越春秋》研究者提供便利。

要對《吳越春秋》進行細緻入微的研究,除了校正勘定其原文外,還必須做好其注疏工作。如果對其原文都有所不解或誤解,則無論是評析其思想內容,還是利用其文史資料,都會發生錯誤。所以,我又在校訂原文的基礎上,廣泛擇取古今學者的考證詮釋成果,採取以經史子集會考的方法進一步考釋了《吳越春秋》中的疑難之處,力求探明其文之本旨,辨明所記史事之原貌。同時,又在疏解原文時反復推敲文字,以使讀者對其原文有一個準確的理解。

為了有利於讀者把握每篇要領,我在注解原文的基礎上,為各篇撰寫了提要,對其內容作了概括述評。

為了便利讀者的閱讀研究,我還精心設計了各種附錄。其中所收錄的研究資料,都用第一手材料進行了認真的校勘,並詳明其出處,以便讀者查考與引用。

本書可以看作是我這兩年來所做課題的一個最終成果,但如果沒有 1992



年以來的種種研究，僅靠這兩年時間，即使能寫出一本厚書，其內容肯定會遜色得多。所以，本書實際上是我二十多年來研究《吳越春秋》的一個最終成果。

最後，我要向項目評審專家致以衷心的謝意，因為如果沒有他們的支持，我就不可能花費這麼多的精力與財力去從事這項工作，這部以善本彙校為基礎的集大成之作也就不會誕生了。我想，讀者們在享用拙著的時候，應該永遠銘記評審專家的功德。在此，我要對齊滄揚先生等專家的大力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謝。此外，我還要感謝知識產權出版社江宜玲女士在出版編輯方面的辛苦付出。當然，我更要感謝廣大的讀者，因為如果沒有你們對拙著的熱愛，我的研究就不可能獲得如此巨大的發展空間。

學無止境，每一個時代對某一事物的認識與解釋總是有局限的而不可能是窮盡的。我雖然孜孜矻矻，不遺餘力，奮鬥不息，想使拙著佔領該研究領域的制高點，以贏得讀者的青睞而使其成為傳世之作。然而，我的努力目標是如此，實際上做得怎麼樣，還得由廣大讀者來評判，而書中不當之處恐也在所難免。在此，我懇切地希望海內外有識之士不吝賜教，以便使拙著不斷完善而為中華傳統文化的研究發揮更大、更好的作用。

張覺

2011年1月26日初稿於滬上四平路金軒

2013年5月30日修改於南翔芳林路院邸